

日据时期朝鲜与台湾的无政府主义者交流

——以申采浩与林炳文的活动为中心

邱士杰

(台湾大学 历史学系,台湾 台北)

摘要: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殖民地台湾和朝鲜分别产生了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台湾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始于1920年代,并先后经历了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合作与分裂两个阶段。此过程中,朝鲜无政府主义者申采浩是与台湾无政府主义者保持长期合作的代表性人物。申采浩与林炳文——台湾知名客籍女性作家林海音的叔叔——在1928年以“东方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名义在东北和台湾分头展开秘密行动。虽然两人在两地先后被捕,但他们为了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而付出的努力以及为此形成的中韩两国革命者的合作却值得后人的记忆与述说。

关键词:无政府主义;东亚;申采浩;林炳文;林海音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7)02-0077-09

一、引言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1920年代是台湾迄今为止唯一有显著的无政府主义活动之时代。虽然无政府主义本身所特有的反组织性格,使得研究者无法轻易经由任何定义来描述“运动”的质与量,但无政府主义者的产生与存在,却是1920年代台湾所拥有的、无法否认的、空前绝后的一道独特风景。

从台湾籍的无政府主义者产生以来,他们便如同朝鲜、日本,乃至大陆上的“主义者”^[1]们一样,展开了跨地域的交流与活动。对台湾的“主义者”而言,由于台湾岛本身的狭小地域与严格的思想管制,致使台湾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不得不具有显著的跨地域性格,而其活动范围至少及于1920年代的东北亚。某种意义上,如果舍弃了这样的跨地域视角而抽象、孤立地谈论所谓的“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运动本身的对象性^[2]便没有得到发掘乃至彰显之可能。

其中,台湾、朝鲜两地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交流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两地的“主义者”几乎都得在两地之外的第三地才能实现交流。众所皆知,两地均因日本的侵略而沦为殖民地,台湾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沦为殖民地,朝鲜则是举国成为殖民地。两地人民有敌忾同仇之共同情感。然而两地“主义者”之间的连带与合作,基本上展开于社会主义思潮译介领先东亚各国的殖民母国日本,以及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的半殖民地中国^[3](也因此,他们的连带与合作往往也能看到大陆与日本之“主义者”的参与)。若先撇开此种现象的成因不提,这种现象几乎是任何研究者粗读相关原始史料之后所必能得到的基本印象。以台湾来说,最经典的史料自然是台湾总督府于1939年秘密编纂的《台湾总督府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十年来台湾社会思潮的演进与人文学术的发展”(16ZDA138)

作者简介:邱士杰,男,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察沿革志第二篇·顿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以下简称《台湾社会运动史》)。

在两个殖民地的“主义者”主要在两地以外的第三地展开连带的前提下,任何迥异于此一普遍现象的特殊历史事件显然特别值得瞩目。虽说现在尚未发现台湾无政府主义者前往殖民地朝鲜活动的记载,我们却能看到朝鲜无政府主义者前往殖民地台湾活动的纪录。这个纪录,就是由1928年被捕于台湾的朝鲜知名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和历史学家——申采浩(丹斋,1880—1936)——所写下的。恰恰是这位冒险前往台湾开展革命与连带的革命家为1920年代的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留下了浓墨重彩、无可抹灭的篇章。

以申采浩与台湾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交流为中心,本文将借此梳理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的某些侧面;并将以现知的1920年代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发展史为线索,说明申采浩在该运动史上的特殊位置。其中本文将着重介绍两个方面的史实,一是申采浩在台湾被捕的相关台湾史料纪录,另一则是与申采浩同案被捕、却长期为其同胞所遗忘的台湾无政府主义者林炳文——台湾知名客籍女性作家林海音的叔叔——的短暂人生。

二、1920年代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概述

关于无政府主义在台湾的萌芽,现知最早的证词来自日本大阪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逸见吉三(1903—1981)。根据他的说法,1915年发动“噍吧哞起义”——这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最大、最后的一次汉人抗日武装斗争——的余清芳(1879—1915),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逸见指出,当年余清芳因向学心切而渡海前往日本横滨,结识了幸德秋水“大逆事件”幸存者所组织的“直接行动派”,并得其成员吉田只次(1877—1963)之指导。后来,余清芳将学到的无政府主义联系于台湾实际,发动起义。^[4]

目前的史料尚无法说明1920年代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否从余清芳的行动中为自身的诞生汲取任何养分,甚至无法证明逸见所说情节属实,但运动确实是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点上、在殖民母国日本,为1920年代的运动形成了初步的人际关系网。

1920年代的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一个无法孤立叙述的对象,它是在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主要潮流之下,伴随着马籍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生事物。根据目前发掘的史料与研究,有两组相互交缠而又彼此拒斥的人际圈,可以作为叙述当时“运动史”的主要线索。第一组人际圈可称为“AB合作”圈。“A”者,指无政府主义,汉语音译为“安那其主义”(anarchism);“B”者,则指“布尔什维主义”(bolshivism),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布尔什维主义开始在世界范围里成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又一同义语。而当时汉语里所谓的“AB合作”(或“安布合作”),指的就是一种主张两种主义相互合作的路线。第二组人际圈所走的则是一条全然迥异于前者的无政府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反对与布尔什维主义合作。此处姑且将围绕着此一路线而形成的人际圈称为“纯粹A派”圈。

台湾“AB合作”圈的核心人物是来自四川的罗任一(罗豁,1897—1965)以及来自台湾的彭华英(1891—1968)。在台湾的社会运动中出现四川人,乍看可能令人意外,但他却是描述此段运动史最关键的人物线索——实际上,没有跨地域参与者的社会主义运动恐怕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5]

1915—1916年,先后奔赴日本留学的罗任一与彭华英,在东京神田区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馆,参与发起了以黄介民(中)、金镛洙(朝)等人为中心的跨地域组织“新亚同盟党”。^[6]1920年前后,这两人又共同在日本参与了李大钊(中)、权熙国(朝)、堺利彦、宫崎龙介、大杉荣(日)等人列名其中的“可思母俱乐部”(コスモ俱樂部,1920—1923)。^[7]后来,两人先后奔赴中国大陆。1924年,他们在上海参与发起社会主义组织“平社”并发行机关刊物《平平旬刊》。在平社以及《平平旬刊》的基础上,台湾出现了最早的社会主义政党,那就是将“赤色”之“中华”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台湾赤华会”(或称“赤华党/Red China Party”)。^[8]

台湾“纯粹A派”圈的核心人物则是来自台湾的范本梁(一洗,1897—1945)。前往日本留学的他

也同样参加了可思母俱乐部,甚至曾当面得到大杉荣的指导。1921年6月,可思母俱乐部在前述青年会馆举办“人类爱的结合讲演会”,这是可思母俱乐部留下最多记载的一次事件。在这次聚会中,范本梁起而发言,却遭临场监视的警察终止,甚至遭到拘禁。此事件之后,范本梁便如同罗、彭二人一样离开了日本,但他转赴北京。^[9]

可思母俱乐部是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东亚诸民族知识人的交流机关”,也是一个跨主义的“AB合作”团体。^[10]虽然可思母俱乐部日后的发展倾向于“B派”,但恰恰是这样——一个“东亚诸民族知识人的交流机关”,同时为台湾“AB合作”圈与“纯粹A派”圈的组织化培养了最初的“主义者”。^[11]

两个圈子的主要组织者共同离开日本并转赴中国大陆,反映当时的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东亚各地“主义者”们实践其理想之新根据地。范本梁前往大陆之际,正是中共即将在上海召开“一大”(1921年7月)之时。据当时的日本情报,一大代表陈公博(1892—1946)所借居的“大东旅社”正好也有一群东亚各弱小民族革命者召开着秘密集会,计划前往即将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请愿。某种意义上,此时聚集了弱小民族分子与激进主义者的大东旅社正是东亚社会运动在上海的缩影。^[12]范本梁日后曾大力赞扬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和田久太郎(1893—1928)当时也在上海。^[13]据日本情报,蔡惠如(1881—1929,台湾抗日民族主义运动家)、彭华英等人曾作为“大阪一派的可思母俱乐部成员”而列席和田于上海举办的宴席。^[14]

但当时的“主义者”们并不只聚集在各国势力纵横交错的上海,还包括了范本梁所奔赴的首都北京。正是在这个积淀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都,申采浩登上了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舞台。

三、申采浩与台湾无政府主义者范本梁的交会(1923—1924年)

范本梁抵京后,除了旁听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更在1922年11月至翌年1月间,与滞留于中国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山鹿泰治(1892—1970)共同出席了景梅九(1882—1961)所主持的“北京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北京AF)”会议。^[15]景氏是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老同盟会员。当时他所主办的《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乃全国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新闻纸。由此可以想见北京在当时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实际上,北京在当时运动中的地位,更直接地表现在东亚各地的“主义者”以北京为中心的集结,特别是朝鲜的“主义者”们。诚如朝鲜共产主义者张志乐(金山,1905—1938)所言,在1919—1923年,“北京有800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300名学生”。“在北京为数不多的朝鲜人竟然出版七份杂志,这在任何少数民族中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16]朝鲜独立运动者李又观(丁奎,1897—1984)^[17]的自作年谱以及朝鲜无政府主义革命家柳子明(1894—1985)的回忆录,更直接披露了一个同时包括朝鲜与台湾无政府主义者在内之跨国人际圈的形成。李又观指出:

1922年(26岁),与友堂李会荣、丹斋申采浩、北京师大教授鲁迅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俄国盲诗人瓦西里·爱罗先珂、台湾革命同志范本梁等郊[交]游。^[18]

柳子明则回忆:

在我被关在看守所的时候,最让我烦恼的一件事,就是通过《朝鲜日报》而得知我最敬爱的丹斋申采浩先生,与李志永(임지영)、林炳文一同被日本警察所逮捕,关进了大连监狱。林炳文是台湾人无政府主义者,我是在1924年于北京结识了林炳文与范本梁。由于我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交流比较密切。当时林炳文供职于北平(北平)邮政局,寄宿于前门外泉州会馆。由于我的生活比较拮据,通过林炳文的介绍,而曾在泉州会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丹斋先生亦透过我结识了林炳文。

当时,李志永从首尔(서울)到北平来,通过我而认识了丹斋先生与林炳文。他们之后前往天津活动,被驻天津日本租界的日本领事馆警察所逮捕。移送大连日本监狱。我听到我所敬爱的恩师丹斋先生被日本人逮捕的消息,心底非常痛苦。丹斋先生,就这样在日本监狱里辞世了。^[19]

虽然他们的记载都不能说明范本梁是否认识申采浩,但范、申两人属于同一个人际圈,却可由此得到证实。

在上述两位革命家的回忆中,柳子明的回忆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所提到的台湾朋友林炳文,正是申采浩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再次出现于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时的重要同志。然而申采浩与林炳文并非被捕于天津。下一节将就此提出说明。

总之,范本梁与群集中国的东亚各地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有很深的交往;正是在这样的交往中,我们得以首次看见申采浩的身影。虽然这些记载首先只是范本梁之个人“活动”,但这些由范本梁、景梅九、林炳文、罗任一、柳子明、李又观、山鹿泰治等东亚无政府主义者所形成的跨国籍、跨国界交往,也恰恰是东亚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体现。

范本梁的活动在1924年间达到高潮。1923年,他以北京为基地,在知名台籍文学家许地山(费瑩,1893—1941)的帮助下组织起无政府主义色彩尚不鲜明的“新台湾社”(机关刊物《新台湾》)。1924年,当彭华英等人以上海为基地着手组织平社之时,范本梁一度前往上海对抗平社。此时他继续发行《新台湾》,但将新台湾社改称为“新台湾安社”,并鲜明地举起无政府主义的旗帜。1926年,范本梁由于北京局势不变而返回台湾,却旋即被捕。以范本梁为中心的“纯粹A派”圈就此正式湮灭。^[20]

罗任一与彭华英的活动也在1924年走向高潮,但以他们为核心而逐步形成的“AB合作”圈却在这一年发生了巨变:首先是“AB合作”圈发生了向“纯粹B派”圈的转化;其次,伴随着这一转化的过程,以台湾社会主义者为主体的组织真正得到了形成。

虽然《台湾社会运动史》将罗、彭两人组织的平社及其《平平旬刊》视为书写台湾共产主义史的起点,虽然包括景梅九之《学汇》在内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在当时曾将平社视为同志,虽然早期的《平平旬刊》确实登载过批判“B派”的文章,但平社及其《平平旬刊》其实是一个高度跨地域的“AB合作”团体。除了罗、彭二人,里面还包括了朝鲜共产主义者尹滋瑛(尹苏野,1894—1938)、日共领导人佐野学(1892—1953)、台湾最早的中共党员及留苏学生许乃昌(秀湖、沫云,1907—1975?)、中国基督教思想家谢扶雅(1892—1991)、知名无政府主义者“抱朴”(秦泰清,生卒年不详)、卢剑波(1904—1991),以及为数甚多的、以上海大学学生为主的大陆各省左翼青年(这些青年后来大多加入中共)。^[21]

许乃昌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指出,这样一个“AB合作”的跨区域团体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下瓦解。^[22]但与此同时,以台籍社会主义者为主体的“纯粹B派”团体却逐步形成。这就是几乎与平社同时发展起来的台湾赤华会/赤华党。但当历史的脚步从“AB合作”的平社走向“纯粹B派”的台湾赤华会/赤华党之时,罗、彭两人也便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逐渐离开了台湾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舞台。^[23]起而代之的,则是此后直到1927年为止台湾最重要的“B派”理论家——许乃昌。^[24]

四、申采浩与台湾无政府主义者林炳文的跨地域合作(1928年)

虽然以范本梁为中心的“纯粹A派”圈因其返台被捕而瓦解,但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不但开始在岛内生根发芽,滞留在中国大陆的台籍无政府主义者也继续活动着。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申采浩再次登上了台湾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舞台——虽然这次登场,竟标志着申采浩革命生涯的结束。

就在范本梁在台被捕的1926年,旅居中国的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柳树人(柳絮,1905—1980)提出了“组织东亚无政府主义者大联盟”的主张,希望各地的运动可以克服褊狭的民族革命而导向社会革命。柳树人估计“迟在二年以内,极力使他成立”。^[25]韩国学者曹世铨指出,“东方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乃是继承亚洲亲和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之传统而于1928年组建起来的亚洲人无政府主义联合体。“据说,此团体中有中国、日本、韩国、台湾、越南、印度、菲律宾等七国(地区)代表200余名参加。他们团结了东亚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自由联合的组织原理下,强化了国际连带,确保了民族自主和个人自由。他们为了建设理想的社会迈进,还发行了名为《东方》杂志。”^[26]

申采浩就是为了发展“东方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而前往台湾,并因此被捕。

关于申采浩在台湾基隆的被捕,当时台湾的报纸曾经绘声绘影地描述了此事。虽其记事内容未必比今日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韩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但其内容至少能够反映当时的台湾报纸如何披露这则消息。^[27]

1928年4月23日,台北的邮局发现从北京“华北物产公司”汇给中国人“刘文祥”的伪造邮政汇款2000元(5张,每张400元),立即回报台北警察署南署,引发日警重视。翌日,新竹邮局发现以“刘孟源”为收款人的伪造邮政汇款。此后,陆续在基隆、台中、台南,以及高雄各邮局发现以“华北物产公司”或“林炳文”为汇款人的伪造邮政汇款,金额总数高达1万元。日警封锁消息(直到全案破获后的5月9日才使新闻解禁),展开了全面搜查。

同年5月8日,一名从日本门司搭船前往基隆的中国船客引起基隆日警的高度关注。据船客名册之登记及该船客的名片,该名中国船客自称“北京前门内安福刘文祥,号孟源”。于是,基隆水上派出所一名叫做“世山”的刑事便跟踪这位恰巧与邮政汇款伪造事件之收款者同名同姓的“刘孟源”,一路到了基隆邮局的汇款窗口,就在“刘孟源”准备签名盖章领走现金之时,“世山”刑事就将他逮捕了。

“刘孟源”被捕之后,先后接受了基隆警察署的警部补“山元”与台北州保安课前来支援的警部“山下”之审讯。“刘孟源”自称中国人,只懂北京话,不懂日语和朝鲜语。于是审问者便找来一名会说北京话的中国人与之对谈,“刘孟源”依旧缄口不语。即便采用笔谈,警方也一无所获。就在“山元”喝斥其“你就是鲜人申丹斋吧”(お前は鮮人申丹齋だらう!)并要将之带进留置场的时候,“刘孟源”忽然激烈反抗并痛殴“山元”。9日晚,“刘孟源”终于承认自己就是申采浩。

当时台湾的报纸是这样介绍申采浩的:申采浩,49岁,朝鲜忠清南道人,别名申寿千、申瑞、申丹斋。对于汉学深有素养,二十六岁时,曾在京城的《皇城新闻》担任汉文论说记者。他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之后,便奔走于上海、北京、沿海洲间岛各地纠集同志、宣传主义。

但申采浩为何卷入邮政汇款伪造事件并为此前来台湾,当时台湾的报纸将之归因于台湾新竹头份人林炳文的“阴谋”。就在台湾各地陆续在4月份发现伪造的邮政汇款之后,同月25日,大陆东北的大连与旅顺邮局也发现2000至4000元的伪造汇款。由于其手段巧妙,大连警察署便判断为精通邮局事务者所为。26日晚,依据国际邮局的通缉电报,犯人似乎就是自称为中国富豪并留宿于大连“大和饭店”的一名青年。警方为此展开了警戒。28日,就在安东火车站的停靠列车上,潜伏在内的警方逮捕了这名青年,并押赴大连审讯。审问的结果,他就是来自台湾“新竹州竹南郡头份庄”的23岁青年——林炳文。

五、林炳文的抗日足迹

这位来自台湾新竹并在辽宁安东被捕的林炳文,正是台湾知名客籍女性作家林海音(1918—2001)的亲叔叔。^[28]

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后,许多不愿接受日本统治的台湾人纷纷转居大陆。虽然多数离开的台湾人总会选择闽、粤等地作为落脚发展之所,但也有一部分人直接前往北京发展。如许地山、张我军(1902—1955)、范本梁(1897—1945)、社会主义者谢廉清(1903—1961)、稍晚一点的宋斐如(1903—1947),都是这样的台湾人。

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1889—1931)也是这样的台湾人。他带着妻子及年幼的林海音,在北京邮政总局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不久,林炳文一家也离台赴京。在林焕文的安排下,他也进了邮局工作。此时是1920年代中期,林海音当时还不到10岁。

据报载,在北京的国际邮局汇兑科工作的林炳文于1927年9月,与台湾、朝鲜、安南、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大陆等六地参与者,在大连共同组织了“无政府主义东方联盟”。为了获得宣传费10万元,

展开了以伪造邮政汇款向中国大陆、关东州、朝鲜、日本、台湾各地邮局^[29]诈取经费的大规模跨区域行动。

林炳文被林海音唤做“彪叔”(客家话“年纪最小的叔叔”)。林炳文是全家最疼林海音的人。照片中的林炳文就如林海音所说的那样“漂亮潇洒”。然而这样的长相却是看相者眼中“骨肉不连”、必然短命的面相。虽然这可能只是看相者随便乱说的瞎话,但死亡的噩运却真切地因为林炳文的抗日行动而降临。林海音回忆云:

他本是一个美满的小家庭,但这时彪叔暗地里和一些朝鲜人做抗日工作,朝鲜人的抗日,常以暴力方法,我听母亲说,他们的床下竟藏置炸弹。抗日固然很对,但是他们利用叔叔在邮局工作,汇钱方便,叔叔为了逃避父亲的注意,就搬出虎坊桥的家,带了妻儿到外面去住。出事的那次是他们叫叔叔带款乘南满铁路。他们不肯自己去,因为过了鸭绿江就是朝鲜,容易被发现。年轻不更事的叔叔,可说是勇而无智,到大连被日本人捉到,毒死在牢里,父亲去收尸,伤心生气,回来不久也吐血病倒……叔叔真是一个反日的无名英雄,……^[30]

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补充云:

心碎的彪婶,带着年幼的独子朝顿和年轻丈夫的骨灰回台湾。北平是她的伤心地,她自此再没回去过。彪叔的死,在英子[林海音]无忧无虑的童年留下了阴影。考小学时,是彪叔牵着她的小手去的;第一次临柳公权玄秘塔的字帖,是彪叔买给她的;是彪叔抓着她握毛笔的小手,一笔一笔教她写。彪叔是那么温和亲切,但他的照片登在日本报上,怎么完全变了昵?他瞪着眼,两手交胸,从没见过他这么凶的样子,非常可怕,焕文先生看了痛哭起来。^[31]

“彪叔”的死,让林焕文一病不起,死于北京。失去了父亲与“彪叔”的林海音为此决意不回台湾念书。在她写给祖父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不愿意失学,但是我们不能半路插进读日本学校的学校。而且,自从彪叔在大连被日本人害死在监狱之后,我永远不能忘记,怀着害死亲爱的叔叔的那个国家。还有爸爸的病,也是自从到大连收拾彪叔的遗体回来以后,才厉害起来的。……所以,我是不愿意回去读那种学校的,更不愿意弟弟妹妹从无知的幼年就受那种教育的。^[32]

林炳文死后,他的夫人——也就是林海音的“彪婶”——带着失去了父亲的五岁孩子与丈夫的骨灰回到了台湾头份。光复之后,1949年前夕,林海音也伴着自己的夫婿举家回到台湾。苍老的“彪婶”拉着她的手哭着说:“转来^[33]好,转来好,你的爸爸和彪叔怎么就没有转来的命呢!”一时间,林海音也痛哭了起来。^[34]

据一份1930年9月之后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黑色青年》所载,大连地方法院对申采浩判处“徒刑十年”,林炳文则“尚在审讯(讯)中”。^[35]但实际上,无论是申采浩或林炳文,后来都惨遭日本人杀害。不同的是,申采浩成为韩国民族运动史上的著名革命家,林炳文迄今却未能广为其同胞所知。

六、结 语

虽然申采浩与林炳文双双被捕,但海峡两岸之间的无政府主义交流却未曾因此中断。以台湾岛内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台湾劳动互助社”(1929年成立)为例,当他们遭到日本警特破获之时,曾发现他们从柳树人以汉语白话文在上海出版的《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中抄录了许多片段。^[36]这种抄录现象不但反映出范本梁之后的岛内台湾无政府主义者基本上未能留下比范本梁更具体系的理论,更反映出台湾与朝鲜的无政府主义者即便相隔于海峡之两岸,也能有思想交流的存在。

此外,众所周知,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渡边政之辅也在1928年前往台湾,并在申采浩被捕的基隆拒捕身亡(10月)。一般认为,渡边正是为了联系同年4月才建党于上海的台湾共产党而来。

与此同时,朝鲜民族革命家赵明河(조명하,1905—1928)也于同年企图在台行刺久宦官邦彦王但

未果(5月)。可见1928年的台湾开始成为东亚各种“主义者”所欲发展的新目标。补充一点:在台湾共产党的建党大会上,除有化名为“彭荣”的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亲至现场指导大会之外,朝鲜共产党也派遣了吕运亨(梦阳,1886—1947)作为代表出席,并有多名朝共党员为大会做保卫工作。^[37]从尹滋瑛在1924年参与平社,到吕运亨在1928年参与台共建党,可以看到台湾与朝鲜革命者为了追求殖民地解放而绵延不断的战斗友谊。

及至目前,海峡两岸学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仍多限于汉语史料,而未能将史料收集延及韩语及日语材料。因此,本文关于申采浩和台湾无政府主义者之交流的介绍,必然只能是极为初步的梳理。若能在日后结合韩国、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相信可以揭示出更为丰沛饱满的朝鲜/台湾无政府主义者交流的历史图像。对于关心此一问题的研究者而言,这应该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注释:

- [1] 在当时台湾的报纸中,各式的社会主义者,都被简称为“主义者”。这可能是日本殖民统治下各地媒体的共同用语。
- [2] 此处所使用的“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一词,引自马克思《资本论》关于“价值”如何成为“对象”的论述。“对象性”问题之所以在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研究中特别重要,至少有两点原因:首先,无政府主义“运动”基于其主义上的信仰而不积极“组织”自身,因此现象上难以作为一个对象。其次,192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特别是包含共产主义运动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常被台湾的历史学界视为研究可能性极低的对象;或者说,只有在否定当时的运动可以被视为运动的时候,当时的运动才在被否定的意义上被视为一个对象。其典型观点可参见若林正文与吴密察关于“台湾共产党”与“台湾文化协会”(1920年代台湾岛内存在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运动组织)缺乏研究之可能与条件的对话。关于第一点原因的讨论与反驳可见:Arif Dirlik:《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关于第二点原因,可参吴密察与若林正文:《台湾对话录》,台北:自立晚报,1989年,第152—157页。
- [3] “民众运动”与“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惯用的成对术语,这对术语反映了中国革命本身的特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强调中国革命必须通过以军队为主体的武装斗争才能胜利。参见毛泽东:《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508—509页。托洛茨基反对派则认为暴动式的“民众运动”才是中国革命之正途。参见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48、282—283页。日本的国民革命研究先驱学者野泽丰首先从学术上将“国民革命”区分为“国民会议”运动以及“北伐”战争两个阶段,从而成功地将把运动内部的区分纳入学术研究。参见野泽豊:《序章·中国の国民革命についての序論的考察》,收录于野泽豊编:《中国国民革命史の研究》,东京:青木书店,1974年。
- [4] 逸见据此认为:嗷吧啐起义并不是日本官方所曲解的那种通过迷信而得到驱使的反文明暴动,因为余清芳等人所谋求的是由台湾人自身相互扶助的共同社会,只是为了使运动大众化,才将带有宗教性的“大明慈悲国”口号调和入他的武装起义之中。参见逸见吉三:《台湾独立運動に散った無名鬼》,《现代之眼》(东京),第12卷第4期,1971年;逸见吉三:《基樞なきアナキスト像》,东京:三一书房,1976年。
- [5] 此外,将特定的地域身份(比如彭华英的台湾人身份)同特定地域的运动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比如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也是过分简单的判断。以彭华英这种依凭雄厚家世而在1910年代前往日本留学的台湾青年为例,他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出身背景,究竟有多少不同于同时代的日本青年?又有多少得益于他的殖民地背景?他究竟更像是个(日本)社会主义者,还是一个具有殖民地特色的台湾社会主义者?虽然关于运动萌芽的研究不可能脱离个别运动者而展开,但若不加判断地将某地域之个别运动者的活动等同于该地域运动整体的发展,运动的诸面相实无法得到良好的揭示。
- [6] 参见小野容照针对“新亚同盟党”内部的台湾—朝鲜连带而展开的讨论:小野容照:《植民地期朝鮮・台湾民族運動の相互連帯に関する一試論—その起源と初期変容過程を中心に—》,《史林》(京都),第94卷第2号,2011年,第35—68页。
- [7] 参阅松尾尊允以“可思母俱乐部”为对象的研究,松尾尊允:《コスモ俱樂部小史》,《京都桥女子大学研究纪要》(京都),第26号,2000年,第19—58页。
- [8] 关于平社、《平平旬刊》,以及台湾赤华会/赤华党,请参见以下考证及研究: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年,第155—187页;Anna Belogurova,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3, pp. 14—15; K. M. Тертский and A.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编:《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Moscow: AST, Vos-

tok-Zapad, 2005, pp. 43-44. 补充一点: 在 1928 年一份关于台湾形势的共产国际英文档案里, 赤华党被同时翻译为“The Red Celestial Party”(意译)与“Sehikwotow”(根据“赤华党”或“赤光党”三汉字之日语发音而来的音译)。K. M. Терпский 推测“Celestial”当源于一个仍然指涉中国的名词:“Celestial Empire”。参见; K. M. Терпский and A.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编,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p. 266.

- [9] 关于范本梁与可思母俱乐部的关系, 请参见松尾尊允, 《コスモ俱樂部小史》, 《京都桥女子大学研究纪要》(京都), 第 26 号, 第 33-74 页; 警视厅特别高等系: 《特别要视察人状况调(大正十年度)》(1921), 收录于松尾尊允编: 《社会主義沿革・二》, 东京: みすず書房, 1984, 第 76 页;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 《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 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译, 台北: 创造出版社, 1989 年, 第 244 页;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 《台湾社会运动史》“无政府主义运动、民族革命运动、农民运动”, 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译, 台北: 创造出版社, 1989 年, 第 3 页。至于他与大杉荣的关系, 可见其自述: 范一洗[范本梁]: 《追慕大杉荣先生(讲稿)》, 《民钟》(广东), 第 1 卷第 8 期, 1924 年。
- [10] 松尾尊允: 《コスモ俱樂部小史》, 《京都桥女子大学研究纪要》(京都), 第 26 号。
- [11] 1924 年, 共产国际从台湾第一个留苏学生许乃昌的手中取得了第一份由台湾人亲手撰写的报告。在这份报告列举的 13 名台湾左翼积极分子中, 就有 4 名间接或直接与可思母俱乐部有关。吕鑫石与黄登洲直接参与了可思母俱乐部, 蔡珍曜与蔡炳曜则是据传也曾参与过可思母俱乐部的蔡惠如的儿子。参见邱士杰: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 表 4-9; 《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臺灣獨立運動計畫二関スル件》, 1921 年 9 月 22 日, 自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不逞團關係雜件/台湾人ノ部》(4.3.2)。
- [12] 邱士杰: 《建党伟业背后的中国与世界》, 《经略》(网刊), 第 8 期, 2011 年, 第 54-60 页。Retrieved February 13, 2016, from: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851/c20>.
- [13] 范一洗[范本梁]: 《追慕大杉荣先生(讲稿)》, 《民钟》(广东), 第 1 卷第 8 期, 1924 年。
- [14] 石川楨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袁广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臺灣獨立運動計畫二関スル件》, 1921 年 9 月 22 日, 自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不逞團關係雜件/台湾人ノ部》(4.3.2); 邱士杰: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 表 4-1。
- [15] 向井孝: 《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 东京: 青鹿房, 1974 年, 第 87-88, 221 页。
- [16] 尼姆·威尔士与金山: 《阿里郎之歌——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朝鲜共产党人》, 赵仲强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3 年, 第 90 页。
- [17] 金良守: 《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和台湾地区接受鲁迅之比较》, 《当代韩国》, 2004 年冬季号, 第 73 页。
- [18] 이우관: 《又观文存》, 内篇: 三和印刷出版部, 1974 年。转引自: 金时俊: 《流亡中国的韩国知识分子和鲁迅》, 收录于鲁迅博物馆编: 《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第 53 页。
- [19] 류자명: 《나의회억》, 심양: 료녕인민출판사, 1984 年, 第 108-109 页。原文为韩文, 此处引文为译文。
- [20] 关于范本梁的活动与生平, 及其与许地山的合作, 请参见邱士杰: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 第 119-153 页。至于范本梁前往上海及其与平社的对立, 请参考以下回忆录: 张深切: 《里程碑》, 台北: 文经社, 1998 年, 第 256, 272, 273 页; 谢雪红: 《我的半生记》, 台北: 扬翠华, 2004 年, 第 153-155 页。
- [21] 关于平社及《平平旬刊》成员的真实身份以及刊物的思想倾向, 请参考以下讨论: 坂井洋史和嵯峨隆编: 《原典中国アナキズム史料集成》“解題・総目次”, 东京: 绿荫书房, 1994 年; 邱士杰: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 第 171-175 页, 表 4-4。
- [22] 参见 Anna Belogurova,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 pp. 14-15; K. M. Терпский and A.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编,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 pp. 43-44; 邱士杰: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 第 175-176 页。
- [23] 罗任一后曾一度加入中共, 却又退出另组第三党。他所参与创建的“中国农工民主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成为民主党派之一。彭华英没有参加台湾赤华会/赤华党的组建, 并在日后转向成为了右翼分子。参见邱士杰: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 第 122-123, 172, 185 页。
- [24] 关于许乃昌的生平与思想, 请参见邱士杰: 《从〈黎明期的台湾〉走向“中国改造论”——由许乃昌的思想经历看两岸变革运动与论争(1923—1927)》, 《史绎》(台北), 第 35 期, 2007 年, 第 69-140 页。
- [25] 柳絮[柳树人]: 《主张组织东亚无政府主义者大联盟(节录)》(1926), 收录于葛惠春、蒋俊、李兴芝编: 《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 下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 第 716-719 页。
- [26] 曹世铨: 《东亚三国(韩、中、日)无政府主义的比较》,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 2 月号, 第 57 页。
- [27] 以下内容均引自《台湾日日新报》的相关报导, 不再另注; 《偽造を發見した・全島郵便局・警戒が嚴重なの

で・一文も詐取出来なかつた》、《台湾日日新報・日刊》、1928年5月11日、第7版；《無政府主義東方聯盟を組織・宣傳費十萬元を・巧妙な國際為替詐欺で騙取した事件・主犯は新竹州生れの林炳文》、《台湾日日新報・夕刊》、1928年5月11日、第2版；《宣传无政府主义之・鮮人逮捕詳報・被系官质问猛烈反抗・終自吐露事实》、《汉文台湾日日新報・朝刊》、1928年5月12日、第4版；《お前は鮮人の申丹齋であらうと・係官に一喝され・猛然として反抗した・基隆署逮捕の劉文祥・遂に泥を吐く》、《台湾日日新報・夕刊》、1928年5月12日、第2版；《为宣传阴谋費・伪造郵便為替・冀詐取數萬元》、《汉文台湾日日新報・夕刊》、1928年5月12日、第1版。

- [28] 以下关于林海音与林炳文的相关记述,如非特别注明,均引自林海音:《番薯人》,《中国时报》(台北),1984年7月26日;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 [29] 虽然报纸列了这些地方,但只有大连、旅顺,与台湾各地是当时的报纸能够详述其“诈骗”行动的地点。
- [30] 林海音:《番薯人》,《中国时报》(台北),1984年7月26日。
- [31] [32] [34] 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第40-41页。
- [33] “转来”,客家话“回来”之意。
- [35] 《内外消息》,《黑色青年》,第6期,出版地不详,1930年。
- [36] 分别是原书的“C. 殖民地革命党不应该与统治国的劳动政党连络”,“E. 革命的组织”,以及“F. 组织的原则”,“G. 战略”。参见柳絮[柳树人]:《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上海:中山书局,1929年,第20-30页,第36-51页。这些段落均保存在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台湾社会运动史》“无政府主义运动、民族革命运动、农民运动”,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译,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年,第41-51页。
- [37]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台湾社会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译,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年,第10页;谢雪红:《我的半生记》,第262页。

(责任编辑:陈小冲)

The Exchanges of Anarchists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ased on the Activities of Shen Caihao and Lin Bingwen

Qiu Shijie

Abstract: The modern anarchist movements of Taiwan and Korea emerged und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e anarchist movement in Taiwan started in the 1920s, and has gone through successively the two stages of the cooperation and division between the anarchism and Bolshevism, in the process of which the Korean anarchist Shin Chae Ho is the representative who has cooperated with Taiwanese anarchist for a long time. Shin and his Taiwanese anarchist, Lin Bingwen, the uncle of Lin Haiyin, the well-known Taiwan woman writer, were engaged in covert operations separately in the northeast and Taiwan in 1928 in the name of the “Oriental anarchist alliance”. Although both of them were arrested in two different places, the efforts they made to overthrow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nd the revolutionary cooperation they formed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re worth remembering and narrating.

Key Words: anarchism, East Asia, Shin Chae Ho, Lin Bingwen, Lin Haiyin

目 录

主管单位:

厦门大学

主办单位: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协办单位: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主 编:

张文生

常务副主编:

陈小冲

副主编:

石正方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华 石正方

刘国深 李 鹏

陈小冲 张文生

张 羽 邹振东

信 强 唐永红

彭 莉 彭维学

蒋小波 谢必震

编辑部主任兼

执行编辑

陈勤奋

英文翻译

黄昆海

封面题字

陈孔立

出版时间

2017年4月

流行文化与两岸共同价值 陈孔立 (1)

期望与认知的错位:台湾青年世代的“大陆印象”研究
——基于对台湾四所高校1030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
..... 刘激元 刘方舟 张晋山 (6)

试析台湾青年的“天然独”心理 邓小冬 沈惠平 (14)

台湾地区高等技职教育的发展困境及对大陆高职办学的警示
..... 陈橄榄 陈武元 (22)

台湾地区要素产出弹性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研究
..... 李 非 徐晓伟 (29)

金融发展视角下台湾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源研究
..... 黄燕萍 刘 榆 (38)

知识产权保护与台资企业溢出效应
——基于Feder模型的省际动态面板分析
..... 盛 黎 (47)

台湾地区当选无效之诉实务述评 张自合 (57)

台湾地区对质诘问权与传闻例外的关系考察 李冉毅 (67)

日据时期朝鲜与台湾的无政府主义者交流
——以申采浩与林炳文的活动为中心 邱士杰 (77)

文风嬗变、语言转换与文学史评价
——论杨逵光复后的中文创作 马泰祥 (86)

生命历程视角下台湾大陆配偶的融入困境与社会支持
..... 曾迪洋 (94)